



〔俄〕史禄国 著

满族的社会组织

——
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商务印书馆

98
K282.1
13
2

满族的社会组织

——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俄] 史禄国 著

高丙中 译

刘小萌 校



3 0027 3589 6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俄)史禄国著;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1912-5

I. 满… II. ①史… ②高… III. 满族-氏族-民族学-研究 IV.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470 号

Mǎnzú de Shèhuì Zǔzhī

满族的社会组织

——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俄] 史禄国 著

高丙中 译

刘小萌 校

责任编辑 陈胜华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12-5/K·450

1997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6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8 插页 5

定价: 13.10 元

S. M. Shirokogo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1924

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24 年版译出

目 录

前言	1
本书满文和汉文词语读音指南	4
引言	9
第一章	16
满语里的本族称谓——满族各分支及其与邻族的关系 ——满族氏族的一般定义——满族氏族名录——对这 一名录的解释	
第二章	46
亲属体系——氏族的组织及其主要功能——新氏族的 形成——世代和莫昆所引起的氏族分蘖	
第三章	76
婚姻——族外婚、叔嫂婚、性禁忌——做媒——婚礼 ——妻子娘家氏族的风俗——离婚	
第四章	107
家庭成员在住房中的位置——禁忌——劳动分工—— 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生育——孩子们的教育—— 妇女的工作和地位	
第五章	144
经济状况：贸易、动物的驯养、农业——所有权和财产 继承——满族人的生活和组织的若干特点	
结语	170

补充注释	173
一、满语研究文献	173
二、满族研究文献	175
三、关于 Mandu 一词的“du”	176
四、关于“满洲”这一名称	177
五、满族的融合性	184
六、满族共同体内的差异	184
七、成为伊彻满洲的一些民族群体的名称	185
八、满族作为民族志上的综合体	187
九、萨满的功能	189
十、涉及满族的形成的女真、锡伯、索伦	190
十一、对俄国人的称呼的演变	195
十二、完颜与满清皇族	196
十三、“koro”与满族亲属称谓体系的转变	197
十四、黑龙江流域和满洲的考古	198
十五、满族人所进述的义和团运动	199
参考书目	201
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	费孝通 213
氏族、家族和家户——东北满族血缘群体的变化	高丙中 230

前 言

作者受俄国科学院（彼得堡）和俄国中亚和东亚民族调查委员会的委派，于 1912 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 1915 年来到阿穆尔河^①两岸，在这里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之中呆了约 18 个月。满族人生活在中国境内，是通古斯人这一主干上的南部分支。满族人表现出初始性的文化成分，作者在研究通古斯人本身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南部分支对北部分支的影响，我理所当然也要予以调查。因此，似乎可以说，如果作者把通古斯人本身作为隔绝在西伯利亚的种族单位来调查，那么，他的通古斯研究是不全面的。^② 在 1917 和 1918 这两年里，作者对生活在南满^③和北京的满族人展开了调查。虽然有关满族的民族志的和语言学的材料是附带收集的，并且，当我们就其数量而言并考虑到它们与通古斯人研究这一基本目标的关系时，这些材料就显得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但是，这些材料如此丰富，而满族人本身在整个通古斯人中又是如此特别，以致作者宁愿把有关材料分别发表。在我的《通古斯萨满教的一般理

① 阿穆尔河 (the Amur River)，俄国说法，即中国所称的黑龙江。——译注

② 想要更详细地了解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华北人类学》（上海，1923 年）的“前言，”我的《对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的民族调查》一文；还可以参考史禄国夫人所撰的《西北部满洲》（满洲西北部的地理描叙）一文。

③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及至清末，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东北，始把此名移作地名，指中国的东北三省，并以长春为界，分称“南满”、“北满”。——译注

论》^①一文里,我只采用了自己对满族萨满教的考察所得的一部分成果。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就此写一个专题报告,其中最有趣的资料将取自一部名为《尼山萨满》的满文手稿^②——该手稿是关于萨满教的唯一书面文献。在访问瑗珲(今黑河——译注)地区的满族人期间,我采录了称得上是满族的《奥德赛》的《特普塔林》(*Teptalin*),^③它是由一位老太太口述给我的。我所记录的这一诗篇以及其它的故事、传说和各种不同的萨满歌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极好的参考资料。不过,我在本书中并没有对这些资料详加引述,因为我这次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以后进一步出版有关通古斯的民族志著作奠定基础,我对本书标以“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的副题,也就限定了它的范围。与此同时,我也调查了氏族对满族社会生活的其它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产生的影响。因此,那些殷切希望在本书中寻找直接或间接地与满族的历史和民族状况有关的一切问题的答案的读者未免会感到失望,因为本书仅仅是描写性的,只偶而谈及各种问题以及论述过这些问题的那些作者。

在1915年——那还是我着手调查满族人之前,我怀着几分的不情愿,因为满族现在与汉族是如此难解难分,以致一些历史学的和民族志的问题只有见多识广的中国通才有望写出详尽的专论。另一方面,我毫不讳言,对满族的民族志性质的调查必须由民族学家们来完成。并且,我对通古斯人的调查正好使我不得不接触那

① 本文最初用俄文发表于《历史文献学志》第1卷(1919年),其结论部分被译载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第54卷,上海,1923年。

② 以前的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授A. V. 格雷本西柯夫于1908年发现了这一手稿。他妥善地收藏着,一直未予出版。——原注

中文本的《尼山萨满》由赵展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译注

③ 这部美不胜收的史诗以及满族民间文学的其它资料有一些部分已被翻译出来,但由于俄国的政治动荡而未能发表。——原注

teptalin 通常写为 debtelin, 满语意为“本子”。——译注

些南方通古斯群体——在这里有望发现对理解北方通古斯群体必不可少的资料。这后一种考虑使我不再踌躇,于是决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一调查中去,尽管我也不是没有想到我将要收集的材料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并且,或许它们永无出版之日。然而,我所获得的材料很快就使我相信,事情并非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到手的资料本身就是重要的。我现在当然也不后悔自己曾把调查扩展到满族。当我着手整理调查所得的民族资料并动笔写现在这个研究报告时,我同样感到顾虑重重。毋庸置疑,对于一个见多识广的中国通来说,对待本书中涉及汉族人的一些问题的部分,他写起来会顺手得多,不过,另一方面,对于民族志资料的分析,还是民族学家容易得心应手。不言而喻,如果我把这些材料束之高阁,等我不在人世之后,再由某个科研机构收藏起来,这无益于那些对这方面的研究怀有兴趣的人士。有鉴于此,我不得不抛开顾虑,并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畅所欲言地议论一些牵涉到中国学的问题。按照皇家亚洲学会出版物的惯例,我在本书中一些有必要的地方附注了汉字,希望各位中国通不吝赐教。

我非常感谢决定出版这一著作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理事会,并特别感谢该会的下列成员:亚伯拉罕先生、查特莱博士、伊万·摩尔根先生和史塔克·托勒先生。他们对于本书的英文修改和出版惠予了大量帮助。

作 者

1923年于上海。

本书满文和汉文词语读音指南

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精确记录满语的发音。既然本书处理的问题是关于社会学和民族志的,而不是关于语言学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词语的阅读搞得那么复杂。此外,就上海目前的技术条件而言,精确的记录在印刷上存在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由于印刷技术条件的限制,字母的打印并不能始终保持一致,举例来说,附加符号有时贴近字母,有时偏离字母,而且,印刷得浓淡不一,下面是我记录的词语的读音指南。

元 音

a : 读作“after”中的 a; ā 和 ǎ 分别是 a 的长音和短音。同样的符号也被用在其他元音上表示该元音发音的长短。^①

ä: 读作“flat”中的 a。

e: 读作“père”中的 è。

è: 在英语中没有对等的音,比 e 的音位更靠后;有时,它接近俄语里“sīn”(儿子)中的 *i* 或汉语里“sī”(四)中的“*i*”。

i: 读作“sin”中的 i。

^① 举例来说,我所谓的音的“长”和“短”并非类似于希腊语语音的那种长和短。满语的实际发音大致是这样的:在许多情况下,音的长短依赖有节奏的重音。所以,我在记录那些我未把重音分辨得很清楚的词语时,没有采用什么符号来标明重音,例如,我记下 māfa 和 ζunğa mafa,其实,这里的 māfa 和 mafa 是一个意思。

- o: 读作“trot”中的 o。
u: 读作“foot”中的 oo。

辅 音

- b: 读作“book”、“bride”中的 b。
 \dot{b} : 把 b 发成连绵双唇音即为该音。它有时转化为 p。^①
c: 读作德语里“zahlen”中的 z 或俄语里“tsar”中的 ts。
 \dot{c} : 读作:China”中的 ch。
d: 读作“do”中的 d。
 \dot{d} : 把 d 发成连绵音即为该音。它可以转化为 t。
f: 与英语中的 f 有点相近,不过,它是双唇音。
j: 类似于“eye”中的第二个音素和“York”中的第一个音素,因此,这两个英语单词可以记作“aj”和“jork”。这一辅音的前面或后面总是伴随着某个元音。
h: 读作“hill”中的 h,但发音更重一点。
 \dot{h} : 与 h 的发音相同,但更偏于软颚音。
g: 读作“good”中的 g
 \dot{g} : 与 g 的发音相同,但更偏于软颚音。
k: 读作“cook”中的 c 和 k。
 \dot{k} : 与 k 的发音相同,但更偏于软颚音。
l: 读作“little”中的第二个 l。
 \dot{l} : 介乎 l 和 r 之间的一个音。
m: 读作“mood”中的 m。
n: 读作“noon”中的 n。

^① 在雷米萨(Abel Remusat)、阿密奥神父(Rev. Amiot)等人的著作中,这几个音以及 t 与 \dot{d} , \dot{g} 与 k 总是弄混。

- n: 读作“ring”中的 ng。
- p: 读作“pipe”中的 p, 但没有那么清晰(连绵)。
- r: 读作南方法语里“roulant”中的 r。
- s: 读作“sad”中的 s。
- š: 读作“shot”中的 sh。
- t: 读作“top”中的 t。
- ṫ: 与 t 的发音相同, 但没有那么清晰。
- v: 读作“love”中的 v。
- w: 读作“wood”中的 w。(在口头满语中,)它通常在 u 的前面, 处于单词的开头。
- z: 读作“has”中的 s 和“zeal”中的 z。
- ž: 读作法语里“jaune”中的 j。
- ç: 大致是 d 和 z 两个音合成的一个破擦音。
- ḍ: 大致是 d 和 ž 两个音合成的一个破擦音, 读作“jar”中的 j。
- ḥ: 是 g 的软颚音。

此外, 我用附加符号表明音的上颚音化^①, 例如 m'、p'、l', 它们分别应该读作“milk”中的 m, “pen”中的 p, “lip”中的 l, 等等。元音上面的线表明强调音, 或双元音。

因此, 同样的满语词语在我这里有多种拼写, 有时, 我提供了不同的读法, 因为我在考察期间做了一些记录。于是, 同样的词, 我有时写作 b, 有时写作 ḃ, 甚至写作 p, e 和 è 以及 a 和 ā 的使用也是如此。有时, 我省掉表示上颚音化的附加符号。因为我有时知道得不很清楚, 所以一般不同时写出书面语和口语的发音, 不过,

① 上颚音化不是固定的, 满族人总是使用两种不同的发音, 例如“ḍalan”和“ḍalaṅ”。后一种发音更有妇女和儿童的特点, 不过, 男子也使用这种发音。这种变化也见于北方通古斯人的方言。

我偶尔也同时列出二者。至于汉语(尼堪发音)词语的转写,只是大致近似而已。在一些地方,汉语词语的转写按照的是满族人的发音。对于俄语词语的转写,我尽可能接近书面俄语的发音,同时,我力图给出俄语单词的正规拼法。

引 言

我们在迄今为止的民族志文献中尚不能窥见满族社会组织的全貌。满族民族志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引起过去的探险家和中国学家的注意，^① 因为北京和南满的满族人——只有这两个地区的满族人可以作为调查对象——过去一直承受着汉族人的影响，他们不仅模仿其技术文化，而且采用了汉族的语言。大城市的、特别是中国的皇城北京的满族人很早就开始仿效汉族人，因为在征服者看来，被征服的汉族人比他们自己文明程度高，因而值得仿效。这些征服者通常乐于学习汉文典籍，有时甚至力图用他们自己的母语阐释汉族人的思想观念，并在自己的民族中大肆宣扬这些东西。^② 这种汉族人对征服者进行和平征服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我们看到，通古斯人（金朝女真——译注）和蒙古人在中国的势力消长的一般性质，也就是更早的金朝和元朝的历史，与满族人从征服到衰落的过程何其相似！^③

住在都城的满族人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他们的民族特征，终于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变成了汉族人。汉族文化的这种影响对满族的势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短时间里，满族人身处汉人的舒适环境之中，学会了哲学思考，却失去了统治汉族人的

① 参见补充注释一。

② 例如，著名的清朝康熙皇帝（才能卓著的改革家和作家）就写过《圣谕广训》，用以宣传汉族人的哲理。

③ 在欧洲历史上也不乏其例，特别突出的是纪元初野蛮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

力量。在满清帝国的这种逐渐的解体过程中，汉族人一直准备着夺回他们对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力。两个世纪的岁月足以使满族人遗忘他们的母语，于是，当他们必须学习它时实际上就像学习外语一样。现在，北京的一些满族学者在阅读满文著作时，根据满文词语的外形标志，把它们当作汉语术语来识别和理解，尽管它们是用满文字母拼写的。例如“人”这个概念，被用满文写成“*nalma*”，但是不读成“纳尔玛”，而读成“人”(*zhèn.*)，用的是北方汉语。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已经忘却了满文字母相应的发音，满文词语的声调和发音现在读起来与汉语相似，例如，“r”这个字母的发音本来与俄语或南方法语的“r”相似，现在被读成了“l”，变成了钝音，就像口头上已不再运用的语言所发生的变化一样。

同样的现象在社会制度、风俗、仪式和技术文化等的变化中也在在可征。然而，满族人即使是现在也还不自觉地保持着一些社会制度——满族人通常用汉语来指称它们，而汉族人又把它们当作满族的民族现象而接受。这种异常现象总要妨碍人们对这些满族制度的考察，并影响人们对它们的真实意义和特性的理解。满族人自己解释它们时倾向于拿它们与汉族人的制度进行类比。不仅如此，他们有时耻于自己是满族人，于是努力通过使用汉语的称谓来证明他们的古老制度源出于汉族。然而，他们的传统和那种拥有某种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显得合情合理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使他们的一些社会制度的古老形式得以保存至今。

在中国现在的疆域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族汉化的各个阶段。在满洲北部，一些满族群体几乎未受多少汉族人的影响；在中国内地各省，满族人甚至忘掉了他们的母语；在满洲中部地区，两种民族文化的因素之间的竞争还在进行，而一些满族人还保留着他们古老的语言和制度。在中国西部的伊犁，我们可以找到一小批满族军事殖民者，当他们到达这里之后，生活在一种隔离状

态,并保持着全部满族文化的单一特色。因此,从民族学的观点来看,最富有启发性和最富于成果的研究只能在满洲的北部进行,在这里,既不存在汉族的影响,两个世纪的地区生活又足以让人们在这一殖民地形成一致、稳定的特性。

这一殖民地是根据中国康熙皇帝的御旨在17世纪建立的。康熙皇帝派遣今吉林以及松花江边的三姓城(今黑龙江省伊兰县——译注)和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译注)的一些满族军队带着他们的家属、牲畜和财产来到这一边疆地区,把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的部落与哥萨克和探险队隔开,因为哥萨克经常进犯并抢劫这里的人民。

瑗琿^①地区本来散住着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满族殖民者原来从事农耕,来到这里后开始开垦土地,于是,他们的军伍性质趋于消失,却开发了满洲最好的农业垦区之一。与此同时,满族人开始与本地区那些靠猎取鹿、貂和其他毛皮动物为生的部落进行贸易。这些土著很快就受了满族人的影响,他们被组织成旗兵——这是满族人通常所采用的军队形式。

直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一地区都还不为汉族移民所知晓,因此,这一地区的人口只包括满族人、达斡尔人和通古斯人——他们并不直接受汉族人的影响,而只受政府的管辖。到这个时期,政府开始把汉族人的思想输入到这些“野蛮的部落”中来。汉族人的思想和风俗被输入进来,靠的是政府所派的代表。这种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在满洲中部和南部那么强烈,在那些地方,汉族群众大批移入,其民族氛围与其说是满族的,不如说是汉族的。因此,在瑗琿

① 旧瑗琿城在今黑龙江左岸的维芙勒依村,城以临近的艾虎河(今俄罗斯称为藏嘎河)而得名,又称艾浑、爱呼、艾浒,满语意为“可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于此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后于黑龙江右岸(今黑河)筑新瑗琿城,黑龙江将军及副都统亦移住此城。原城仍设城守尉镇守,至清末庚子事变为俄军占领。——译注